2014 年第 3 期
（第 13 卷）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政策形成的政治经济分析

黄斌全[1]，熊启泉[2]

（1.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2.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忽视政治过程的经济学并不能对发达国家长期实施农业保护政策提供合理的解释，这些政策不仅会降低其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而且还在长期内阻碍了世界农业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在农业保护政策的形成中，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都是重要的。文章引入经济和政治变量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发达国家农业保护形成的理论解释和争议进行了系统地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在制定农业保护政策的过程中具有现状偏好的特征，且一国农业保护水平与政策制定者的政治意识形态、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和农业集团规模大小有关。

关键词：农业保护；新政治经济学；政府偏好；政策需求；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3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4)03－0076－09

一、引　言

在一定阶段内，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保护水平随之上升，这是共存于许多经济体农业保护政策发展模式的一个典型事实[1]。尽管发达国家农业部门的就业和产出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对这些倾向于补贴农业的国家而言，农业和农业政策在其国际贸易谈判中一直占据着非常关键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发达国家甚至希望看到 WTO 谈判因在农业政策问题上的争议而崩溃[2]。显然，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达成在削减农业保护水平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名义保护率开始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但根据 Anderson[3] 的测算，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对其可贸易农产品仍然保持着非常高水平的支持，在 1985—2004 年间，每五年的平均名义保护率分别高达 55.5%、48.2%、36.6% 和 33.9%，特别地，发达国家这期间对其进口竞争产品的名义保护率均超过了 50%。发达国家农业保护的持续存在导致 WTO 多哈回合谈判多次陷入僵局，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多边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发展中国家难以有效反对发达国家对农业的高度保护。农业成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例外，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困难重重。因此，如何实现大幅度缩减那些导致贸易扭曲的国内补贴、关税和出口补贴的政策目标，仍然是 WTO 多哈回合谈判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尽管自《国富论》出版以来，每一代经济学家中的大部分都赞成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关于通过专业化分工获得贸易利益这一很有探索性和说服力的观点，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由贸易最优性的论证，但现实中几乎没有国家支持将农业加入贸易自由化的议程[4-5]。在公共政策领域，发达国家的政治家通常以农业具有导致市场失灵和选择扭曲的特殊性质①[6] 为由对本国农业提供高水

收稿日期：2014－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8&ZD030)

作者简介：黄斌全(1985—)，男，广东汕头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E-mail：hbqmadrid@126.com

①Stiglitz 在对农业政策理论的一些说明中指出，这些特殊性质主要包括：期货、保险和信用市场的不完全或缺失；农业投入的公共产品特性；不完全信息；农业生产的外部性；收入不平等。

平支持。但是，农业政策大部分是无效率的[1]，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在农业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也经常是次优的[7]。现实中源于非效率目标的保护政策制定与经济学理论所倡导的自由贸易是相悖的，这主要是由于一些影响政策结果的重要政治因素在经济学分析中被忽略了。将影响政策决策的政治过程“黑箱化”的所谓纯粹的经济学解释并不能为农业保护政策的形成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这种方法认为，作为“社会计划者”的政府所选择的政策都是最大化社会福利的。

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是不可分割的。新政治经济学为考察政策形成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它尝试解释现实世界中政府为何远离自由贸易而实施无效率的干预政策，能够较为全面地揭示影响政策形成和变化的政治经济因素。理解政府选择农业保护政策的成因，有助于我们分析如何通过改变激励约束以实现农业政策改革，达到期望的政策效果，从而推动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目前，新政治经济学已成为解释政府政策决策行为的主流理论。本文将在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同时考虑经济和政治因素，利用 19 个发达国家 1995—2009 年的面板数据①，首次从动态角度系统地考察农业保护持续性的成因。

二、文献综述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农业经济学家一直尝试将政策内生化，关注政治因素对农业保护政策形成的影响，并逐渐发展出了用于分析农业政策成因的新政治经济学框架。如果将政策制定的政治市场概念化，均衡政策就是政策需求方（农民或农业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在政治市场上相互博弈的结果。

Olson 的集体行动逻辑理论[8]可以对发达国家给予农业持续保护提供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发达国家农业保护的高成本是由众多的消费者和纳税人承担的，而利益则归于一个相对较小的农业部门。由于消费者众多和纳税人众多，搭便车成为一个合理的现象，而被保护的农业生产者数目较小，更容易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对政府政策决策产生压力。Anderson 和 Hayami[9]也提供了一个对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政策形成的经典描述性分析。从供给角度，由于在发达经济中农业劳动力和工资收入者实际收入受农产品价格的影响都大大减少，提供农业保护的成本和阻力都变小了，政策供给的可能性提高；从需求角度，由于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率和收入低于城市居民，他们的政策保护需求提高，而且在发达经济中，农村的交通、通信和教育的质量与城市相差很小，所以农民更容易组织起来寻求政策保护。显然，在这类政治经济学解释中，政府对政策需求方寻求农业保护活动的反应是积极的但不是基于政治理性的，因此均衡政策更多的取决于政策需求方的压力行动。

De Gorter 和 Tsur[10]，Swinnen[11]等研究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政治家—选民”互动模型来分析影响农业保护政策形成的政治经济因素。在这个一般均衡框架中，理性的政治家像企业家一样行动，他们在政治市场上提供保护主义政策以最大化来自选民的政治支持；选民的政治支持是其效用变化的函数，而效用变化是由政治家所提供的政策引起。该模型的几个关键结论是：不同部门之间相对人均禀赋收入的外生变化将引起政治家补偿那些经历相对收入减少的部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保护将随着农民数量的减少而增加；每单位转移的无谓成本增加将导致对农民的补贴减少。但是“政治家—选民”互动模型忽视了农业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为获取政策而进行的集体行动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所有现实政治体制中，特

① 这 19 个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美国。

殊利益集团都会积极参与政策决策过程[12]。Grossman 和 Helpman 的"保护待售"(Protection for Sale)模型则更关注政治家和利益集团之间在政治市场上的互动,并证明了有组织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对政策制定者形成的政治压力使其更容易得到政策的保护[13]。这一结论说明当发达国家的农业集团规模缩小时,它们更容易获得农业政策的支持。

在实证研究方面,早期文献还是更多地对影响农业保护政策形成的经济因素进行定量分析。Anderson 和 Hayami,Honma 和 Hayami 的研究被视为农业保护政策经济决定因素的基础性分析之一[9,14]。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农业保护随着农业比较优势、经济中农业所占份额以及农业相对于制造业的贸易条件的下降而明显增加。Lindert,Beghin 和 Kherallah,Olper 等实证研究都试图将政治因素包含进计量经济模型。Lindert 通过对一个游说集团的统计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较小的部门规模、GDP 中农业份额的下降、较低的农业相对收入、无谓成本和政府部门的税收需求对农业保护政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5]。但 Lindert 的模型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Beghin 和 Kherallah 在一个民主国和非民主国的混合样本中考察了政治制度和权利对农业保护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农业保护政策制定中,公民自由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高于工业化国家[16]。Olper 在解释农业保护中也引入了政治权利指标和民主化指标,但他发现增加的政治因素并没有给模型增加重要的信息[17]。在 Honma 和 Hayami 研究的基础上,Thies 和 Porche 建立了综合性的计量政治经济学模型对 OECD 国家 1986—2001 年农业保护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并证明了政治因素的重要性[18]。他们的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政治变量包括政体、政党分化程度、决策过程关键参与者的数量和选举周期等。Dutt 和 Mitra 的实证研究则发现,政府意识形态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都是农业保护政策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控制变量的变化而变化[19]。

综上所述,已有的解释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持续性的实证研究或者忽略了政治因素的影响,或者只是在考察经济因素的计量模型基础上简单引入政治因素,并且这些研究基本将政府的政策决策视为一个静态过程。建立在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动态模型将填补这一领域实证研究的空白。

三、发达国家农业保护形成和持续的政治经济因素

Rodrik 指出,在原则上一个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应该包括以下四个基本要素:公民的个人偏好;游说集团的集体行动;政策制定者的偏好;政治制度[20]。De Gorter 和 Swinnen 将其延伸到农业政策领域的研究中,形成了农业保护政策决定的新政治经济学一般分析框架[1],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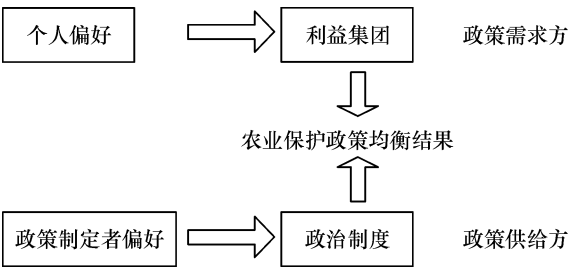


图 1 农业保护新政治经济学模型的一般结构

在政策的需求方,公民的个人偏好取决于他们的要素禀赋、经济收入和制度等因素。一方面,公民可直接通过投票、政治献金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支持来表达对政策的需求;另一方面,公民也可以组织成利益集团来进行游说活动。在政策的供给方,保护水平因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政治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政治制度环境通常取决于那些决定社会规则制定的规则和政策制定者的偏好。一方面,如果政策制定者在政策决定过程中具有很高的专制性,其偏好就将对政策结果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的偏好可能服从于公民或利益集团偏好。一般情况下,政府是上述"专制性"和"服从性"两种极端之间的一个组合,在新政治经济学模型中,政府像

理性人一样行动，政策制定者面临的目标函数通常是对社会福利和自身利益的权衡。

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农业政策制定过程可以被视为政府与本国公民或利益集团之间在政治市场上进行讨价还价所产生的均衡结果。结合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农业保护政策形成并得以持续的重要政治经济因素包括：

（1）经济发展水平。Anderson 和 Hayami 认为农业保护的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函数[9]。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从农业转移资源以促进工业部门发展，农产品成本被保持在低水平以便城市人口为工业部门提供低工资的劳动。随着经济的增长，城市人口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使他们的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不断降低，于是当不断缩小的农业部门开始寻求保护时相对富裕的城市人口几乎不会进行阻碍，政策逐渐向有利于农业部门的方向转化。此外，经济增长还将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这使政府有能力关注社会一般利益，从而促使农业保护政策供给的增加。

（2）农业比较优势。农业比较优势的高低对保护政策形成的影响是存在争议的。Anderson 和 Hayami 在一个高度简化了政治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下，提供了比较优势与农业保护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假说[9]：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下降，农业保护将增加。Opler，Thies 和 Porche 等实证研究的结论也支持了这一假说[17,18]。但引入了游说行动的模型则认为农业比较优势的提高使游说行动更有效率，进而提高农业保护[19]。本文将在一个动态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下进一步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

（3）农业集团规模。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有组织的农业利益集团更容易获得农业保护（在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尤为明显）。发达国家农业人口的减少、农场规模的扩大以及农村教育、交通和通信水平的不断发展都有助于农民组织集体行动对保护政策进行游说。但是，Beghin 和 Kherallah[16] 使用农业在 GDP 中的份额作为农业集团规模的代理变量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是与 Olson[8] 的集体行动逻辑相悖的，他们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搭便车行为与较低的农业保护有关。近期 Dutt 和 Mitra[19]，Bastelaer[21] 等检验结果则为集体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支持。因此，农业集团规模的大小对农业保护水平影响的实证关系也是存在争议的，有待在更系统的框架内进行检验。

（4）政治制度。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有大量的学者开始研究政治制度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但是，政治制度对农业保护政策形成影响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都仍处于初步阶段[1]。Swinnen 指出一国政治制度环境不仅与民主政权和独裁政权的不同影响有关，还与不同的选举制度、官僚机构与政策执行机构的自主权有关[2]。特别地，由于政党倾向于依附特殊经济阶级，不同派性的政府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一国在位政府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取向将决定其政策制定的偏好。在农业保护新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不同派性政府的偏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国政策制定的政治制度环境。根据 Dutt 和 Mitra[19]，右派（Right-wing）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赋予资本福利更多的权重，而左派（Left-wing）政府则更关注于劳动力福利，左派政府更倾向于提供农业保护。但在他们之前，Bates 通过对非洲农业市场干预模式的观察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派性假说（Partisan Hypothesis）[22]：尽管社会主义政府强调经济平等，但他们比其他政府更可能对最贫穷农民的农产品实施低价格政策，从而攫取他们的收入。不难看出这一派性假说认为左派政府和农业保护的关系是负向的。本文将在新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对派性假说提供一个更深刻的检验。

（5）政策惯性。在公共政策领域，为什么政府不选择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能增进效率的政策？特别地，在农业政策领域，发达国家倾向于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保护，而保护一旦确立便会受制于“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保护水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Fernandez 和 Rodrik 认为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在分配上的不确定性[23]。他们发展的现状偏

好理论表明,当改革的受益者和受损者无法被事前识别时,政府是偏好于保持现状的,它们的政策决策将具有惯性,并因此反对那些能增进效率的政策。但以往的实证研究基本忽略了政策惯性这一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将在一个动态框架下检验 Fernandez 和 Rodrik 的现状偏好假说,考察政策惯性是否影响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的形成。

四、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一)模型的设定与估计方法的选择

为了更准确地考察政治经济因素对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政策形成的影响,本文将采用动态面板数据(Dynamic Panel Data,DPD)模型进行估计,即:

$$p_{it} = \alpha p_{it-1} + \beta X_{it} + \e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p_{it}是 t 年 i 国的农业保护水平,X_{it}代表影响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政策形成的政治经济因素。η_i 为不可观察的各国区域效应,ε_{it}为误差项。

本文采用广义矩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估计 DPD 模型。虽然 DPD 模型引入了时间效应,但由于模型的解释变量包含了滞后被解释变量,这会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出现,且当误差项存在序列相关时,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到的估计值将是有偏的甚至是无效的。Arellano 和 Bond 提供的差分广义矩[24](Difference GMM,DIF-GMM)方法采用 t-2 期前的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被解释变量一阶差分滞后项的工具变量,从而得到一致且更为有效的估计结果。但是,DIF-GMM 估计量有限样本的特性较差,比较容易受到弱工具变量的影响从而导致估计出现偏误。Arellano 和 Bover[25],Blundell 和 Bond[26]提供的系统广义矩(System GMM,SYS-GMM)方法克服了上述问题。SYS-GMM 相对于 DIF-GMM 而言,增加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的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Level Equation)的工具变量,这使前者的估计相对而言更加准确。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的被解释变量为农产品名义保护率(Nominal Rate of Assistance,NRA)。这个农业保护水平代理指标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农业激励扭曲"(Distortions to Agricultural Incentives,DAI)数据库。NRA 主要用于衡量各国政府政策对农业生产者提供的保护水平,NRA 越大表明该国对农业生产者提供的支持越大。

针对前文提到的影响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持续性形成的政治经济因素,本文选择了相应的代理指标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使用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GDPPC)表示,农业比较优势使用各国的人均农业生产的增加值(Agriculture Value Added per worker,AVAPW)表示,农业集团规模用各国农业就业在总就业中所占份额(Share of Agriculture in Employment,SAE)表示,政治制度使用各国主要执政党的意识形态(Chief Executive Party Orientation,CEPO)表示,政策惯性则使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表示。GDPPC,AVAPW 和 SAE 的数据来自 2013 年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CEPO 的数据来自 2012 年政治制度数据库(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DPI),在 DPI 中,根据各国主要执政党经济政策制定的取向不同,在位政府被区分为右派政府(赋值 1),中间派政府(赋值 2)和左派政府(赋值 3),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代表政党不同的公共利益目标取向,是大部分经济政策形成的基础。

在收集了上述数据的基础上,为了减少异方差给回归结果带来的有偏影响,并且便于直接观察变量之间的弹性大小,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取自然对数处理。取自然对数后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数
lnNRA	-1.6846	1.8953	-10.7020	0.9252	285
lnGDPPC	10.3079	0.3792	9.3468	11.4636	285
lnAVAPW	10.1684	0.4987	8.5737	10.9677	285
lnSAE	1.4308	0.5420	0.0953	2.6247	285
lnCEPO	0.5591	0.5253	0.0000	1.0986	285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 DIF-GMM（一步和两步）和 SYS-GMM（一步和两步）对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持续性形成的 DPD 模型进行估计。在模型设定方面使用 Arellano-Bond Test 来检验回归方程是否存在序列相关，使用 Sargan Test 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并且通过 Wald Test 对系数的联合显著性进行检验。从表 2 的结果可知，一步 DIF-GMM 和一步 SYS-GMM 模型的 Sargan test 的结果均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假设，这意味着某些新增的工具变量与扰动项相关，不是有效的工具变量。因此，在这里一步 DIF-GMM 和一步 SYS-GMM 的估计结果并不适用。两步 DIF-GMM 和两步 SYS-GMM 的二阶序列相关检验（Arellano-Bond Test for AR(2)）结果均支持回归方程，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假设，Sargan Test 的结果也表明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假设。因此，两步 DIF-GMM 和两步 SYS-GMM 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而且工具变量也是有效的。而且，系数联合显著性的 Wald Test 的结果也都拒绝解释变量系数为零的假设。这里两步 DIF-GMM 和两步 SYS-GMM 的估计结果是值得信赖的。

从表 2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除了通过两步 DIF-GMM 估计得到的 lnSAE 系数不显著外，其他由两步 DIF-GMM 和两步 SYS-GMM 估计得到的变量系数都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两个模型的系数估计值也非常接近。但在有限样本情况下，DIF-GMM 的估计系数相对于 SYS-GMM 而言存在下

表 2　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持续性形成的政治经济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DIF-GMM		SYS-GMM	
	一步	两步	一步	两步
$\ln GDPPC_{it}$	-0.5140***（-3.05）	-0.5070***（-12.11）	-0.6260***（-4.58）	-0.6046***（-9.72）
$\ln AVAPW_{it}$	-0.9149***（-2.66）	-0.9425***（-18.97）	-0.5457*（-1.63）	-0.5326***（-5.39）
$\ln SAE_{it}$	0.1225（0.34）	0.1104（1.09）	-0.6031**（-2.14）	-0.5489**（-2.52）
$\ln CEPO_{it}$	0.0796（1.11）	0.0758***（4.46）	0.2399***（3.34）	0.2190***（7.28）
$\ln NRA_{it-1}$	0.6544***（13.90）	0.6556***（42.20）	0.8722***（28.47）	0.8731***（54.38）
CONS			12.4143***（3.33）	12.0036***（7.28）
AR(2)	-0.4949[0.6207]	-0.6779[0.4978]		-0.7156[0.4742]
Sargan	180.9265[0.0000]	18.4134[1.0000]	217.7582[0.0000]	18.3023[1.0000]
Wald	733.59[0.0000]	24721.47[0.0000]	1571.03[0.0000]	18854.43[0.0000]
Countries	19	19	19	19
OBS	247	247	266	266

注：***、**、*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的数值为 t 统计量，方括号内的数值为 p 值；DIF-GMM 模型的待估参数中不包含常数项，因为它被差分过程处理掉了；一步 SYS-GMM 不提供序列相关性检验；所有检验都通过 STATA11.0 软件完成。

偏的情况,Blundell 等[27]通过蒙特卡罗模拟实验表明,当增加的矩条件有效的情况下,SYS-GMM 估计量可以很好地提高精确性,并且有效地减少有限样本偏差。因此,本文以两步 SYS-GMM 的估计结果为基础对影响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持续性形成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分析。分析表明:

(1)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抑制了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水平的提高。这一结果与 Anderson 和 Hayami[9]等研究的结论是相反的。这与样本的选择有一定的关系,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农业保护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是正向的。但就发达国家的样本而言,人均 GDP 的提高反而使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水平降低了。对该结果的一个合理解释是,国际组织和国际贸易协定对农业保护的限制对收入较高的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形成了约束[2],从而抑制了发达国家政策对农业保护政策的供给。这一结果也表明农业保护发展的典型事实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农业保护随经济增长而增长这一关系并不是单调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特别是在乌拉圭回合后全球削减农业补贴和农业保护水平的大趋势下,政府制定政策维持较高的农业保护水平的激励更可能是来自于其他政治经济因素。

(2)当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较低时,农业保护水平较高。这一结论说明了 Anderson 和 Hayami[9]假说在发达国家同样适用。当面临农业生产比较优势下降时,发达国家政府会增加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以保持其竞争力。发达国家政府对这种在经历衰退的产业的支持被称为"补偿效应"(Compensation Effect),即相对于正在经历增长的产业,落后的或者正在遭受经济逆境的产业将从发达国家政府制定的政策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补偿效应的形成来自于以下两种可能性:从需求角度看,落后的农业部门为寻求政策支持给政府施加了政治压力,对这些部门来说,游说活动产生的回报可能高于生产性经济活动;从供给角度看,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时,政府更愿意提供保护来维持农业生产者的生活水平。

(3)当农业集团规模变小时,农业保护水平提高。这一结论再一次支持了 Olson 的集体行动逻辑[8]。从政策需求角度看,农民本身在争取高水平保护上就拥有共同利益,随着农业人口数量的减少,这有效地控制了搭便车行为,使他们更容易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行动对政府施压从而获得政策保护。从政策供给角度看,农业人口相对于工业人口不断下降,对农民进行补贴的成本也变得相对较低,政府从工业向农业转移收入的政策在政治上更容易实施,致力于最大化政治支持和社会福利的政策制定者向来有激励去选择那些集中利益和分散成本的政策。

(4)左派政府与农业保护水平的关系是正向的。这一结果表明政治意识形态对农业保护水平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变量系数符号并不支持 Bates 的派性假说[22]。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更关注劳动力福利的左派政府会倾向于提高农业保护水平。农业保护的提高会导致以制造业产品衡量的劳动力实际工资增加,而以农产品衡量的劳动力实际工资减少。因此,只要这些劳动力的农产品支出占其总支出的份额较小,他们的福利就可以通过农业保护得到提高。由于农产品支出份额与收入成反比,发达国家的左派政府会倾向于提供农业保护以增加劳动力福利。

(5)农业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过去 30 年来农业生产水平由于技术进步、生产专业化、规模经济程度提高而经历了快速增长,但发达国家在降低农业保护程度上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农产品名义保护率依旧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近年来发达国家在农业补贴和农业保护水平上所作的削减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限制。对于已经确立了农业保护的发达国家而言,改革将触动既得利益,农业保护水平向下调整所带来的利益重新分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动态视角下的计量模型检验结果支持了 Fernandez 和 Rodrik 的现状偏好假说[23],政策惯性在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持续性的形成中具有重要影响。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构建了首个包含政治经济因素的动态模型尝试对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持续性的形成提供新的解释。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了依赖于政策制定者偏好的政治制度在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发达国家，赋予劳动力更多权重的左派政府更倾向于提供农业保护，而且政策改革向来就涉及强大的既得利益，具有政治敏感性，发达国家的政府在政策制定中是具有现状偏好的。此外，实证结果显示农业保护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典型事实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一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不再是政府维持高水平农业保护的原因。其他经济因素的检验则表明，较低的农业比较优势和较小的农业集团规模都能促使发达国家的政府提供农业保护政策。

传统经济理论无法对发达国家政府在农业领域长期采取次优政策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政府的目标往往是在社会福利与政治支持之间的权衡，而并不仅仅在于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新政治经济学将经济理性扩展到政策决策的政治过程中，明确了政治因素是政府实施无经济效率政策的重要原因。在新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对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政策持续存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发达国家政府的政策形成过程，这对进一步大规模削减全球农业保护，推动农业贸易自由化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DE GORTER H，SWINNEN J.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olicy[C]//Gardner B，Rausser G.（eds.）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Elsevier Science B. V.，2002：1893－1943.

[2] SWINNEN J.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Policies：Recent Contributions，New Insights，and Areas for Further Research[J]. 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2010，69(1)：33－58.

[3] ANDERSON 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rice Distortions[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25－77.

[4] BHAGWATI J. Protectionism[M]. 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1988：9－15.

[5] BHAGWATI J. Free Trade Today[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5－11.

[6] STIGLITZ J. Some Theoretical Aspect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J].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1987，2(1)：43－60.

[7] KRUEGE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olicy[J]. Public Choice，1996，87(1－2)：163－175.

[8] 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5－52.

[9] ANDERSON K，HAYAMI 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East Asia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M]. London：Allen and Unwin，1986：7－9.

[10] DE GORTER H，TSUR Y. Explaining Price Policy Bias in Agriculture：The Calculus of Support-Maximizing Politician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1，73(4)：1244－1254.

[11] SWINNEN J. A Positive Theory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4，76(1)：1－14.

[12] GROSSMAN G，HELPMAN E.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M]. Cambridge：MIT Press，2001：1－13.

[13] GROSSMAN G，HELPMAN E. Protection for Sal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4)：833－850.

[14] HONMA M，HAYAMI Y.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in Industrial Count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6，20(1－2)：115－129.

[15] LINDERT H. Historical Patterns of Agricultural Policy[C]//Timmer P.（eds.）Agriculture and the State：Growth，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29－83.

[16] BEGHIN C，KHERALLAH M.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atterns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4,76(3):482 - 489.
[17] OPLER A. Determinants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The Role of Democracy and Institutional Setting[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1,52(2):75 - 92.
[18] THIES G,PORCHE 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2007,69(1):116 - 127.
[19] DUTT P,MITRA D. Explaining Agricultural Distortion Patterns:The Roles of Ideology,Inequality,Lobbying and Public Finance[R]. Agricultural Distortions Working Paper,2009.
[20] RODRIK D.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C]//In Grossman G,Rogoff K.(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lsevier Science B V,1995:1457 - 1494.
[21] BASTELAER 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Pricing:An Extended Empirical Test of the Interest Group Approach [J]. Public Choice,1998,96(1 - 2):43 - 60.
[22] BATES R. Patterns of Market Intervention in Agrarian Africa[J]. Food Policy,1983,8(4):297 - 304.
[23] FERNANDEZ R,RODRIK D. Resistance to Reform:Status Quo Bias in the Presence of Individual-Specific Uncertain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1,81(5):1146 - 1155.
[24] Arellano M,Bond S.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J]. Reviews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2):277 - 297.
[25] ARELLANO M,BOVER O. 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5,68(1):29 - 51.
[26] BLUNDELL R,BOND S.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115 - 143.
[27] BLUNDELL R,BOND S,WINDMEIJER F. Estimation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Improving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andard GMM Estimators[R]. The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2000.

On the 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Polic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HUANG Bing-quan[1], XIONG Qi-quan[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Economics that ignores political process cannot provide a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to long-term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polic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not only lower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but also acts as a major obstacle to agricultural trade liberalization. New political economy emphasizes tha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cess are both important in the 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policies. The paper constructs a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and includes economic variables as well as political variables. By using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empirically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nd controversies of the 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polic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government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on a status quo bias in formulating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their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levels ha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licy makers' political ideology,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strength of agricultural interests group.

Key Words: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new political economy; government preferences; policy demand; allocation of resources